

# 国家免费教材为何变成盗版



资料图片

## 核心提示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盗版教材教辅材料泛滥成灾,一些出版社甚至将盗版英语磁带充当国家免费教材,这些盗版教材内容质量错误百出,制作材料质量低劣,严重干扰了我国中小学生的正常学习。社会各界呼吁:应严厉打击制裁盗版复制教材的犯罪行为,还孩子一个优良健康的学习环境。

## 盗版英语磁带竟成国家免费教材

记者15日从湖北警方案情介绍中了解到,江西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以下简称“江西红星”)未经著作人授权许可,通过转换载体形式,盗版复制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仁爱”)制作发行的七、八、九级英语教材听力磁带,销往江西、湖北各地,数量巨大,“北京仁爱”多次登报公告和电话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该出版社置若罔闻,继续从事盗版侵权行为,为此请求立案侦查。

在湖北省版权局及国家版权局鉴定该英语听力磁带为侵权复制品后,湖北警方成立专案组开展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初步查实,自2006年7月至2008年12月,“江西红星”共生产复制了120余万盒英语教材听力磁带,价值1000余万元,通过江西省新华书店在省内发行销售给学生,部分磁带对外省市销售。

湖北警方证实,“江西红星”盗版复制发行的是国家采购免费赠送学生的音像教材,质量极其低劣,数量、金额特别巨大,严重影响了广大学生正常的英语学习,社会危害和影响特别恶劣。“江西红星”出版社社长喻晓峰被公安部列为网上通缉逃犯。2009年1月8日,犯罪嫌疑人喻晓峰在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被警方抓获归案。

## 以次充好侵扰学生正常学习

“北京仁爱”负责人赵勇介绍说,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他们不断收到来自江西赣州、萍乡等地市的一线教师和学生来函来电反映,称其被迫在当地新华书店配套订购的英语录音教材内容发音

模糊不清,单词及词组漏读、错读现象严重,无法正常学习,要求英语教材著作单位退货赔款。

记者从诸多来信中看到,盗版英语磁带严重干扰了学生的学习。江西省东乡县二中初三(16)班的李松、李海兵、余鹏等9名学生联名来信反映其被迫订购的江西红星盗版英语磁带,内容发音不准确,并伴有漏读、错读现象,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英语语音学习。

赵勇介绍,“江西红星”由于未经教材著作单位授权,每年均得不到正常教材修订内容信息,红星社为了赶时间进度,只能擅自使用上年度的旧版教材作为母版,盗版复制音像教材,供广大中小学生学习使用。因此,导致了红星盗版音像教材的内容和正版纸质教材内容不相配套,学非所学,严重浪费了学生的学习时间,极大地伤害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盗版音像教材由于制作匆忙,又没有专业的语音编辑和合格的录音主讲人,导致盗版录音带的母版内容制作质量非常低劣,再经过大量盗版复制后,录音带更加模糊不清,无法正常使用。

赵勇说,盗版录音带危害性巨大。首先,盗版录音带为了追求低廉的制作成本,使用劣质或回收再生塑料作为原材料,而劣质和回收再生塑料挥发性很大,其散发的有毒气体会极大地伤害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

其次,盗版录音带作为再生复制品,每复制一次,信息失真至少达到20%以上,因此,使用盗版音像教材,会使学生的英语发音越来越变味,越来越差,甚至学成了负数。

第三,我国中小学生的母语是中文,对于中文助学产品中出现的文字差错和发音错误,学生有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而英语助学产品不像中文助学产品,我国大多数小学生初学外语时,由于不懂英语,对英语助学产品的文字错误和发音错误没有纠错能力,他们往往会把盗版英语助学产品的错误字句和错误发音当成正确的来学习,这样他们的英语水平和学习成绩只能是越学越差,有相当多学生学成了负数。

## 应重拳打击制销伪劣及盗版教材的犯罪行为

针对上述制销盗版音像教材的行为,一些专家认为,国家免费教材竟然变成了盗版教材,国家出钱采购、赠送学生使用的竟是错误百出无法使用的垃圾盗版产品,这严重损害了政府的诚信和公众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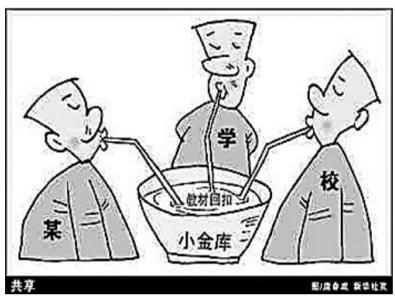
湖北警方介绍,“江西红星”的行为已构成单位犯罪,且有特别严重的情节,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法律规定的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湖北警方为确保此案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严厉打击盗版复制国家免费教材的犯罪行为,将此案向上级部门和各级政府有关领导汇报,并拟提请为公安部督办案件,以达到阻止杜绝有关方面游说部分不了解案情的领导,干扰警方正常办案的情况发生,从而保证彻底查清“江西红星”销售网络及盗版教材的去向,使盗版复制发行国家免费教材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一些专家认为,中小学盗版教材教辅屡禁不止,泛滥成灾的最大原因是,地方执法机关对盗版犯罪危害性的认识程度远远不够,以及地方保护势力的滋生蔓延。从上述案件就可以看出端倪。记者采访发现,从2004年秋季至2006年春季,“北京仁爱”一发现盗版案件,就向各级新闻出版部门(扫黄办)举报,并请求扫黄办查处,但结果是盗版案件越查越多。

“制销伪劣盗版教材犯罪行为应重拳打击。”中国法学会法学专家、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安平呼吁,地方政府不能出于部门及地方利益考虑,放任盗版复制教材的行为发生。因为,这损害的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一颗颗幼小的心受到了伤害!

据新华社



共享



资料图片

# 3省区更换组织部长 异地交流力度扩大

## 核心提示

目前31位省级组织部长中,有20人是“外来和尚”,其中中央空降11人,异地交流9人。2008年一年中,从中央空降3人,为最近四年最多;2009年1月的上半月,异地任职者2人,已达近六年最高值。

1月13日,原政协浙江省副主席楼阳生转任海南省组织部长。这是自去年12月份以来,我国各省(区、市)组织部长人事调整过程中的第三位“外来和尚”;前两位分别是吉林的黄贵明和内蒙古的李佳。去年12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黄贵明出任吉林省组织部长;今年1月,辽宁副省长李佳出任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长。

短短两个月内,三省区组织部长换届,频率之快为近年罕见。观察人士指出,种种迹象表明,2008年中央调整各省市区组织部长的力度逐渐加大,“外来和尚”任省级组织部长成主导,2009年异地任职加速或成新气象。

## 去年中央“空降”力度大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组织部长中,中央空降11人,异地交流9人,占所有省级组织部长的65%。

“空降可以使新官与当地没有瓜葛。”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此举“可以保证在一定时间内,组织部长在选拔当地干部时比较公正”。但他强调,“如果没有制度,没有监督,谁在这个位置也不能保证永远不出问题。”

从2004年至今,从中央“空降”地方的组织部长达11位之多。其中2004年一年“空降”了4位,是“空降”力度最大的一年。从2005年到2007年,“空降”力度有所变化,每年调任一到两人不等,但到2008年,力度再次加大。

对此,葛剑雄指出,去年是最近四年来,中央对地方组织部长“空降”力度最大的一年,这一趋势总体在扩大。

## 今年“异地交流”受关注

在异地交流的组织部长中,从2004年到2008年的五年中,每年都会有一到两人实现异地交流,没有出现较大变化。

但在2009年1月上半月,有两位组织部长实现了“异地交流”:辽宁省副省长李佳调任内蒙古,政协浙江省副主席楼阳生调任海南。这一数字已经达到自2004年以来的年度最大值。其调整

力度之大,实为罕见。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由外省籍干部出任的有8人,而完全由本土人士出任组织部长的仅有两地:山东和浙江。

随着时间的推移,异地调任组织部长是否还会加速?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做法值得关注。

## 异地任职涉及中组部新思路

“外来和尚好念经”。中央空降或异地交流组织部长,对一个地方的干部遴选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这种变化或与十七大后中组部的工作新思路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干部任命由一个或少数人决定的做法,对裙带关系、用人腐败和由于干部任用不当导致的其他腐败问题,至少能够起到牵制作用。”

葛剑雄说:“中央空降或者地方交流的做法,还是立足于防范。”如何保证外来组织部长熟悉当地干部情况?葛剑雄建议,可以充分发挥地方人代会的作用,地方重大人事决策经地方人大程序把关,并能借鉴西方国家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分,这样就会最大限度发挥这一做法的正面效应。

## 年轻化和高学历成新趋势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现任31位组织部长中共青团工作经历的达15人,从年龄构成看,“50后”有25人。

“现在看,省级组织部门的领导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汪玉凯指出,随着中央候补委员和共青团任职经历者出任省级组织部长,或许会有更多年轻人来到组织部。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统计,31位省级组织部长中,拥有博士学位的5人;梁滨管理学博士,李锦斌法学博士,李佳哲学博士,柯尊平工学博士,陈存根农学博士。拥有教授或副教授头衔的3人:陈存根、胡泽君、柯尊平,均成为学者从政的典型。

对此,葛剑雄认为,“学者从政”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学者类型多样:“从政更看重管理能力。如果有的学者能够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从事管理的实际经验有机结合起来,在更大的空间加以施展,也是不错的。”

“这表明组织部门干部的素质在提高。”汪玉凯认为,学者从政出任组织部长,有博士学位的组织部长越来越多,正一改组织人事干部“万金油”的形象。

据新华社

## 感恩父母 感恩生活

可怜天下父母心。一直为子女操心的父母现在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了: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孩子青春期时与父母争吵不断,但他们22岁起态度会发生转变,开始认识到父母的重要性,开始理解父母,感激父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1月21日新华网)

天下多数父母,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为子女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他们的辛苦是值得的,且也不求子女在物质上对他们有过多的回报。养儿育女费心费神,这几乎是所有天下父母的切身体会。譬如,处在青春期的子女,缺乏生活经验,自身不能独立地应对社会,却满脑子的叛逆念头。排斥父母的话,做的事,有的甚至自以为比父母懂得都多。父母的严格管束还会让一些孩子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令他们做出让父母垂头丧气之事。

应当说,这个由父母和子女共同组成的天下,这个纷纭变化的世界,这个人人与人应和谐相处的社会,需要人人的节制和谦卑,需要珍视家庭价值,需要建设温情涌动的感恩文化。身为子女人女,成人以后开始出现反省的人生转折点,全在于他们通过有限的人生经历,慢慢知道了锅是铁打的这类道理。22岁,这是生理和心理正发生急剧变化的年龄,这是能懂事的年龄,像专家所说的,当他们不得不自己处理财政、起居饮食、人际关系和健康等问题时,就逐渐意识到父母曾对自己付出多少。他们受某种灵性的导引,会深深地开悟,突然间发现父母在他们生活和心理中的位置变得重要,他们知道了父母比谁都关心自己,他们有了耐心去倾听父母的意见,父母呵护的温暖让他们感到了身心的惬意。

每一个人都是从年幼无知过来的,都有反省自身的人生阶段。人子人女理解父母的时候,也是他们深刻了解社会的开端。他们懂得了感恩的意义,在感恩中学习感恩,学习对父母感恩,还开始学会对每日的一餐一饮感恩,对自然的所有恩赐感恩,对他人感恩,对生活感恩。 今语

## 有一种豪华与工作不相匹配

近日,一篇名为《北川政府110万采购豪华越野车》的帖子在国内各大论坛上引发网友热议,帖子中展示的“北川采用工作用车中标公告”中显示,1月12日,北川县以110万的高价购得兰德酷路泽越野车。80后作家韩寒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发文提出质疑,何必买这么贵的越野车,并且是最高配置?(1月22日《新快报》)

购置豪华越野车目的,只是为了工作方便。北川政府采购中心的官员这样解释。但这样的解释是多么的牵强,多么的难以服众。豪华与工作方便,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吗?是豪华起来,工作就方便,不豪华,工作

就难以进行吗?不买对的,只买贵的,这是一些人的一种思维。有了这样的思维,有人就敢放开胆子,置法律法规而不顾,置尚未安置好的灾民们的困苦而不顾,把自己的工作用豪华装备起来。并把这种豪华做工作的宣言,悬挂到“采购工作用车中标公告”上去。这种行为,令人不齿,令人鄙视,无疑,他们使众人寒心的行为,也是打击众人社会信心的行为。

韩寒很冲动也很天真,于1月15日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对“北川110万豪车”提出质疑时,根本不能相信当地政府购置豪华车的事实。“谣言,这一定是谣言,幻觉,这

一定是幻觉”,韩寒如此坚信。但他在公告中又发现,“在采购的车辆中,品牌和车型是五花八门的。并且在各个车型中,几乎都选择了比较高的配置,比如普拉多,就选择了导航版”。韩寒是写小说的行家,虚构是他的工作。但可能不知道,也可能知道,现实往往大于他的虚构,一些生活当中的官员做起事来,比小说虚构的人物还要狠还要绝。他看到的幻觉非幻觉,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本身。

当下,有一种人正在推行消费爱国说,在这些人的眼里,不知北川官员的豪华消费行为,是不是也是一种爱国行为。 伊文

## 漫画:摇着尾巴做人

一对年轻的情侣手挽手走在大街上,两人衣服背后各有一条狐狸尾巴。1月19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杨家坪直港大道遇到了身着“狐狸装”的一对男女,并附有手机拍摄的照片。(1月21日《重庆商报》)

狐变美女,在古代文人的想象中习见习闻。《洛阳伽蓝记》中载: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后来才发现她“有尾三尺,似狐尾”。



## 不能让权力文凭再折腾下去

广东省委書記汪洋近日批评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或束手无策,或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中国网1月20日)

此言一语道破了官员手中文凭的“含金量”与“含权量”之别。我们可以接着问下去:学历高了,为什么处理问题的能力低了?为什么那么多官员乐于取得高学历?高学历是怎么取得的?当然,更直接的问题是,官员要高学历做什么用?

官员文凭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早已成为一个问题,被称为“文凭腐败”。据报道,2004年10

月,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清查,发现67万名县处级干部中,每40个人就有一个文凭有问题。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官员读硕、攻博之风愈来愈盛,不少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某某名牌大学的硕士或博士,甚至硕博。

官员文凭越来越高,本来是件好事,笔者并不反对某些确有真才实学的官员取得高学历,或确有管理才干的高学历者当官,而是反对把高学历当金钻,尤其是当这种文凭成为权学交易的产物时,一切都变味了。也正因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引发热议,原因就在于“学历没有跟着官位长”。相比之下,那些学历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低的官员们实在该扪心自问。

就笔者的观点,“权力文凭”现象也是一种折腾,是一种危害甚大、败坏学风和社会风气的陋习。这种折腾看似各得其所,实则是两败俱伤,一方面败坏了官员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加剧了学术腐败。

相信很多人还记得那位骄横的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的狠话:“我掏钱买文凭,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当更多的官员都拥有这种心态或与其类似的心态时,笔者以为,也就是社会信任危机到来之时。 朱四倍

## 公务员养老 也应向企业看齐

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制度能够衔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国务院要求5个试点省份今年正式启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据悉,一旦改革方案实施,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将大幅减少,向企业看齐。(1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

此次国家启动的,旨在追求“与企业基本一致”的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试点,显然值得欢迎。但是,全面来看,这样一个开端的积极性,无疑仍有相当明显的可存疑之处,那就是,这样一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其改革的对象仅仅只是事业单位人员,而并没有将同样享受特殊优待养老待遇的机关事业单位纳入其中。

这样一种回避非常令人遗憾。一方面,它不利于彻底解决既有的养老待遇因职业身份不同而差距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将可能制造出新的养老待遇不公——即事业单位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养老待遇不公,以“教师”这一最大的事业人员群体为例,这些年来,尽快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公务员水平”的法律規定,一直是普遍的社会呼声。现在,作为事业单位人员的教师的退休待遇将向“企业看齐”了,而机关事业单位却不必同样看齐,两者的待遇差距势必更加放大,而“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水平”的落实恐怕也将更加可望而不可即。

公务员既是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社会服务人员,更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天职的人民公仆。既然如此,那么,其显然没有任何理由将自身的职业待遇建立在远超过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企业人员,以及其他包括事业单位人员在内的社会公众——主人之上。否则,势必违背基本的职业公平和政治伦理。同时,也难免为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推行,增添不必要的执行难度——公务员享受着优厚的养老待遇而去劝说事业单位人员独自去“向企业看齐”,如何能让后者心服气平呢? 张贵峰